

中国“大跃进”饥荒成因再辩 ——政治权利的视角

刘 愿*

摘要 针对杨涛和范子英提出的评论意见,本文再次澄清以下问题:森的食物获取权理论是否适用于计划经济下的饥荒分析,“大跃进”运动中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高积累是否减少了农民口粮消费,大饥荒成因实证研究中的计量问题。最后,本文提出,发展一个包括政治权利在内的饥荒理论,是深入理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饥荒问题的钥匙。

关键词 集体积累, 饥荒, 政治权利

在一个计划的制度中,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变成了政治问题。

——哈耶克(1940,第297页)

半个世纪前,中国在“大跃进”运动背景下爆发了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饥荒。“大跃进”饥荒是多重因素所致,这在学界已达成共识。但在诸多成因中,各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如何,人们仍众说纷纭。时任国家统计局及国家计委领导的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在1959年6月反思“大跃进”运动的危害时,精辟地分析了农民缺粮的原因:“去年农民多吃了约350亿斤,城市多销了约100亿斤,多留种子约200亿斤,因此今春农民吃粮供应比较往年更加紧张。”¹换言之,农民口粮不足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强制性公共食堂制度,二是城市偏向的国家粮食高征购,三是人民公社集体高积累。公共食堂制度及粮食高征购两个因素已得到较深入的研究,但集体高积累这一因素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大跃进”运动与中国1958—1961年饥荒》(以下简称《饥荒》)一文则尝试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将集体高积累因素融入中国“大跃进”饥荒成因的分析之中。

杨涛和范子英分别对《饥荒》一文提出了建设性评论意见,包括:森的食物获取权理论是否适用于分析中国“大跃进”饥荒;集体高积累是否真的减少了农民口粮消费;实证研究中代理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如何理解具体制度背后的政治激进主义对“大跃进”饥荒的作用。本文在回复上述评论意见基础

*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通信地址:广州大学城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510006;电话:(020)39310072;E-mail:hope428@163.com。

¹ 薛暮桥(1984,第90页)。

上,提出从政治权利缺失视角理解传统社会主义国家饥荒问题的新思路。

一、食物获取权缺失的两个维度： 经济权利与政治权利

在森的开创性研究之前,人们对饥荒成因的认识停留在粮食总供给层面。森基于1943年孟加拉大饥荒和1974年埃塞俄比亚饥荒的研究提出食物获取权理论,从而将饥荒成因研究扩展至分配领域,大大加深了人们对饥荒问题的认识。根据森的《贫困与饥荒》,不可否认的是,森对饥荒的分析是以市场经济体制为背景的,其所定义的权利包括个人资源禀赋(所有权组合)和交换权利映射(为个人的每一资源禀赋组合规定他可以支配的商品组合集合的函数),权利失败包括直接权利失败和贸易权利失败,前者指可供自己消费的粮食产量减少,后者指一个人通过贸易获得的粮食减少,即初始资源禀赋及相对价格变化是权利失败的原因。²在森的语境下,直接权利失败并非范子英所指的“(农民)对自己生产的粮食的处置权”的失败。例如,森举例说牧民既食用自己的牲畜,也卖出牲畜换取粮食消费。³以此推理,如果牧民牲畜产量下降,可供他直接消费的牲畜量减少,表现为直接权利失败;由于牲畜产量下降通过交换获得的粮食下降,表现为贸易权利失败。

的确,森的饥荒理论并没有完全忽视政治因素的作用。Sen(1983)比较了民族独立后的印度和中国,认为缺乏自由新闻媒体和政治压力集团导致政府未及时救灾是中国“大跃进”饥荒的成因,并指出权利研究必须超越纯粹的经济因素,同时考虑政治制度安排。但森的这一主张并未得到发展,政治权利因素没有真正融入其分析框架。我们并不否认中国“大跃进”饥荒是农民食物获取权的失败所致,问题的关键是:农民食物获取权的失败究竟是源于经济因素还是政治因素?森研究孟加拉大饥荒发现,“受灾最严重的职业组是渔民、运输工人、稻谷脱皮者、农业工人、‘其他生产性职业’中的就业者、工匠和城市工人,受灾最轻的是农民和收益分成佃农。”(森,2001,第92页。)然而,中国“大跃进”饥荒受灾最严重的恰恰是农民这一群体。如果中国农民拥有支配和消费粮食的自主权,即使粮食大幅度减产也不至于发生如此严重的饥荒,至少农民不会成为饥荒的主要受害者。《饥荒》一文证明,在赶超战略和“大跃进”运动背景下,除了强制性的国家高征购及公共食堂制度等因素之外,人民公社的集体高积累进一步减少了农民个体可消费的粮

² 森定义了职业组 j 中每个人的最大食物权利 $F_j = q_j p_j / p_f$, 或 $F_j = q_j a_j$, 其中 a_j 是职业组 j 的食物交换比率 (p_j / p_f), 直接权利失败和贸易权利失败分别表现为 a_j 和 q_j 的下降。(阿马蒂亚·森, 2001, 第 62—69 页)

³ 阿马蒂亚·森(2001, 第 69 页)。

食是“大跃进”饥荒的又一重要原因。可见，农民的食物获取权遭受国家和集体两个层面的强制性剥夺。⁴

正如 Grada 在其新著作中所说的那样，苏联、中国、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的饥荒恰恰是在宣称要根除贫困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不无讽刺意味。⁵新中国“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实行平均主义分配政策，建国以来的一系列集体化运动也已将农民个体之间的财产权利平均化，公共食堂制度又彻底取消了私有财产。因此，按照经济权利分析框架，饥荒在农民内部的影响应该是均等的。然而，“大跃进”饥荒的分布即使在同一个村庄内也存在显著的阶层性，表现为干部与群众分布不均衡、不同政治成分群体分布不均衡。

例如，在信阳事件中，社员比基层干部及其家属死亡率高，五类分子⁶比劳动群众死亡多。据淮滨县桥沟公社的万围、左围大队统计，万围大队的生产队干部死亡占 8.8%（204 人，死亡 18 人），社员占 26.7%（1515 人，死亡 404 人）；左围大队的干部死亡占 11.8%，社员死亡占 15.24%；左围大队贫农死亡人数占其总人数的 13%，地主富农死亡占其总人数的 31%。⁷又如，据安徽亳县典型调查，1960 年 1—5 月间，在非正常死亡人口中，贫雇农占本阶层的 28.25%，中农占本阶层的 12.5%，地主富农占本阶层的 44%。⁸

既然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的经济权利是无差异的，为何农村干部及其家属、政治成分好的阶层更容易在饥荒中幸存？显然，政治权利的差异是不同群体死亡率差异的重要原因。公共食堂将口粮强制性集体化，农村干部享有支配农民口粮的特权。在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干部及其家属的多吃多占、贪污腐化导致粮食分配不均，普通农民极可能因口粮严重不足而饿死；政治成分差的地主富农在粮食分配序列中又处于劣势，往往因为微不足道的错误而被扣饭、体罚甚至殴打致死。

概言之，无论是从城乡之间还是村庄内部微观层面来看，中国的“大跃进”饥荒是农民政治权利缺失而非经济权利失败所致，将政治权利因素融入

⁴ 范子英引用 Berstein(1984)的研究结果，认为“苏联提高征购率是有意而为之的，中国的征购率的提高是由于对当时情形误判造成的，过高的征购率只是提高征购量一个未预料的结果”；从新近的研究结果来看，这一结论值得商榷。1953 年实施统购统销以来，中国农民“基本没吃饱过”（杨继绳，2008，第 831 页）。由于国家征购粮食过多，1954 年四川即爆发了 1949 年以后的第二次饥荒（只不过这次饥荒的严重程度和范围比“大跃进”饥荒要小），李井泉以富农煽动闹粮为名予以镇压（东夫，2009）。因此，高征购并不纯粹是浮夸风造成的，也并非对当时情形的误判造成（1954 年没有浮夸风），而是赶超战略背景下的一种具有一定刚性的制度安排。另外，范子英认为苏联逼债也是中国粮食高征购多出口的原因之一。这一说法也不符合历史事实。沈志华考察了 20 世纪 50 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历史，提出“至于传闻中所说苏联曾逼迫中国还债的情况，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的记载”，（2002，第 93 页）他却发现了 1961 年 3 月苏联为缓解中国的饥荒提供援助的资料（2002，第 86 页）。实际上，中国提前还清债务，并不是苏联逼债，而是毛泽东为了“争一口气”主动提前还清的。（杨继绳，2008，第 594—595 页。）

⁵ Cormacó Gráda, 2009. 转引自 David Rieff(2009, p. 46)。

⁶ 即历次政治运动中定的地、富、反、坏、右。

⁷ 杨继绳(2008, 第 51 页)。

⁸ 杨继绳(2008, 第 272 页)。

森的食物获取权理论能够提供一个更为宽广的饥荒分析框架。

二、集体高积累是否减少农民口粮消费

如上所述,“大跃进”饥荒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最直接的原因则是明确且唯一的,即农民无法获得维持生存所需要的粮食。如《饥荒》一文图1所示,农民口粮不足可能的原因有:粮食生产大幅度下降使“蛋糕”变小;国家高征购从农村转移了超额粮食;人民公社提高集体积累挤占了农民口粮;公共食堂浪费及干部腐败减少了农民口粮。杨涛和范子英均对集体提高积累挤占农民口粮提出了质疑。杨涛认为,《饥荒》一文无法解释1960年集体提留比例下降而当年饥谨状况未见显著好转,集体高提留对饥荒的影响机制有待进一步分析:一方面高积累与抽调劳动力、体能高消耗工程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另一方面,集体提高提留只会挤占农民的现金和其他分配,不会直接消减口粮;在存粮即将耗尽时,公社可以利用多提留的种子、饲料和储备粮应急救灾,并不一定挤占消费。范子英主张大量的集体提留粮食主要用于增加“大炼钢铁”和“兴修水利”的农村劳动力人口的消费,并认为“除此之外,很难找到集体提留的用途和原因”。

的确,抽调农村劳动力、兴办体能消耗高的工程、集体高积累是农村“大跃进”政策的共同后果。不过,人民公社在“大跃进”中确实是为了兴办包括水利和炼钢工程在内的扩大再生产活动而提高集体积累的。根据1958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社积累和消费问题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迅速增加的公共积累,首先应该用来购买生产资料,增加基本建设,扩大再生产。”⁹集体提留包括公积金和公益金两部分,公积金用于扩大再生产,公益金用于兴办集体福利事业。“大跃进”运动期间,农村市场取消,集体收入主要以实物(粮食或经济作物)形态存在,现金只占很少比例。¹⁰从粮食分配角度看,集体提留包括种子、饲料粮、储备粮和其他用粮。种子用于来年农业生产,饲料粮用于发展集体家畜家禽的养殖,储备粮用于农村备荒备灾、互通有无,其他用粮为集体用于发展社办工业的资金来源。因此,集体增加提留势必减少农民口粮消费。例如,农民人均收入从1956年的43元降至1959年的37.6元(减少5.4元),其中人均现金收入从10.6元降至9.4元(减少1.2元),实物形式的收入减少4.2元,占78%。¹¹需指出的是,我国农村收益分配主要集中在秋收以后,因此集体收益分配对粮食消费及人口死亡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1959年集体提留比重最高,以致1960年死亡率最高;1960

⁹ 黄道霞等(1992,第507页)。

¹⁰ 农村产品被国家低价收购,因此集体现金收入有限。

¹¹ 国家统计局(1980,第4页)。

年集体提留比率下降，是1961年饥荒结束的原因之一。

表1详细列出了农村集体各收入分配环节。农村集体总收入在扣除当年各项费用（主要是生产费用）后的纯收入在国家税收、集体提留和社员之间分配，集体提留以扩大再生产的公积金为主。炼钢铁、修水利属于扩大再生产活动，主要支出是劳动力的粮食补贴，作为生产费用列支，来源则是此前各期的集体积累。¹²如表1所示，农村集体生产费用从1957年的92.4亿元增至1958年的104.6亿元，集体提留则从1956年的12.4亿元增至22.6亿元；1959年的春荒使农村“大跃进”有所退却，但夏天的庐山会议再次掀起“大跃进”高潮，农村生产费用从1959年的95.6亿元增加至1960年99.3亿元，集体提留在1959年达到最高值。因此，在产量不变的情况下，集体提留增加确实会减少农民在下一个分配年度前的口粮消费；当集体积累有效转化为生产力和粮食增产时，农民未来的口粮消费才可能增加。然而，由于自然灾害及人为政策失误，粮食产量在1959—1961年三年间连续下滑。

表1 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收益分配

单位：亿元

年 份	总收入	各项费用		纯收入	国家 税收	集体提留			社员分配	
		合 计	生产费用			合 计	公积金	公益金	合 计	现金
1956	343.9	78.7	77.0	265.2	33.8	12.4	10.3	2.1	219.0	54.1
1957	367.5	97.3	92.4	270.2	36.2	22.6	18.0	4.6	211.5	52.2
1958	410.2	109.3	104.6	300.9	39.0	47.4	40.6	6.2	214.5	53.0
1959	384.0	102.8	95.6	281.2	38.4	48.1	39.6	6.9	194.7	48.7
1960	367.7	106.5	99.3	261.2	36.4	16.2	11.0	3.7	208.6	51.5
1961	412.3	110.1	101.0	302.2	26.4	28.0	17.3	8.2	247.8	61.7
1962	423.3	119.6	109.6	303.7	27.5	27.6	18.7	6.1	248.6	60.9
1963	440.5	124.7	115.7	315.8	28.8	30.9	22.7	6.7	256.1	63.2
1964	489.6	141.4	133.3	348.2	33.2	45.7	35.0	8.3	269.3	66.2
1965	531.7	149.8	133.2	381.9	29.8	47.5	34.9	7.6	304.6	77.2

注：总收入—各项费用=纯收入，生产费用占各项费用90%以上；纯收入=国家税收+集体提留+社员分配；集体提留包括公积金和公益金；社员分配包括实物（主要是粮食）和现金两部分。

数据来源：农牧渔业部计划司（1983，第510—511页）。

据上引薛暮桥的估计，1958年我国农村多留了种子约200亿斤，仅此一项集体提留就相当于当年农村留粮的6.2%，相当于当年农村粮食消费量的9.3%，无疑会减少农民1959年春口粮消费。当然，在正常情况下，在农民口粮不足时公社将利用多提留的种子、饲料粮和储备粮应急救灾，从而缓解饥荒。不过，“大跃进”运动时期的国家和集体本位主义思想使这一本能的救

¹² 1961年3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第二十四条规定“生产大队兴办基本建设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应该从公积金内开支”(黄道霞等，1992，第634页)。

灾机制基本失效,以致出现了农民饿死在堆满粮食的仓库边上的怪象。¹³因此,集体高积累的确减少了农民口粮消费。

如表2所示,在饥荒最为严重的四川省,“大跃进”时期大幅度提高集体提留,其后集体提留显著下降帮助农民摆脱饥荒。从1961—1963年,四川绵阳地区农村粮食分配中集体提留的比重从20.5%降至17.5%、13.4%。其中,种子比重从12.5%分别降至10.8%、9.2%,饲料粮比重从4.6%降至3.4%、2.2%,储备粮比重从2.3%降至1.6%、1.5%,其他用粮比重1961年为1.1%,1962年略增至1.7%,1963年降至0.6%。社员分粮比重则从47.1%增至60.4%、62.2%,社员人均分粮从225斤升至335斤、377斤。¹⁴可见,减少集体提留比重及总量有效增加了农民口粮消费,反之亦然。

表2 1961—1963年四川省绵阳地区农村人民公社粮食分配比例

分配项目	1961		1962		1963	
	比例(%)	人均(斤)	比例(%)	人均(斤)	比例(%)	人均(斤)
粮食分配总数	100	474.6	100	554.5	100	606.4
征购	32.1	152	22.0	122	24.4	148
集体提留	20.5	97.4	17.5	97.3	13.4	81.4
种子	12.5	59.2	10.8	60.0	9.2	55.5
饲料	4.6	21.9	3.4	18.7	2.2	13.6
储备粮	2.3	11.1	1.6	9.0	1.5	8.6
其他用粮	1.1	5.3	1.7	9.6	0.6	3.4
社员分粮	47.4	225	60.4	335	62.2	377

数据来源:绵阳地区农业局(1976,第114—138页)。

实际上,农村集体积累政策在饥荒前后发生明显转变。1958年8月《指示》要求“尽多地积累一些”¹⁵,导致1958—1959年集体提留占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纯收入的比例高达15.8%、17.1%。为缓解饥荒,1961年3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规定“生产大队扣留的公积金和公益金一般控

¹³ 例如,在1960年信阳事件中,信阳共有40亿斤的粮食库存,但政府未及时开仓放粮导致农村人口大规模死亡,饥民看着粮库里有粮,也没有人想到抢粮食,有人就饿死在粮库旁边。(杨继绳,2008,第54页。)1960年冬,河北省委决定农民口粮每天降为4两(16进位,相当于10进位的2.5两),省委负责人提出“吃四两是马列主义,超过四两的是非马列主义”。张家口市蔚县为了模范执行省委指示,做一个“真马列主义者”,将农民口粮标准再压低一两,规定每天定量为3两,导致蔚县死亡人口迅速增加。唯独该县东城公社书记武万升秘密召开大队书记会议并决定:从公社掌握的粮食储备中给公社每人分10斤粮食,增产队可以分15斤。为此,武万升做好了丢官的准备。1960年冬,张家口地区要杀一批过不了冬的牲口度荒,市委书记胡开明请示省委领导刘子厚,刘子厚不敢决策直至亲自请示毛泽东并得到毛应允后才敢杀牲口救荒。(杨继绳,2008,第494—495页。)可见,在大饥荒时期,集体提留作为一种集体财产受到严格保护,擅自挪用救灾者将冒巨大的政治风险,以致开仓放粮这一公共赈灾救济机制失效,农民有粮却不能吃。从这个角度看,范子英引用的Berstein(1984)对饥荒的解释——“一些人为或者自然的因素导致粮食产量下降,同时粮食储备又不足以抵消风险,于是饥荒便发生了”,也是不可信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粮食储备不足,而在于救灾机制失效。

¹⁴ 当然,1962—1963年的粮食增产对增加农民口粮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¹⁵ 黄道霞等(1992,第507页)。

制在大队可分配收入的5%左右”。¹⁶这种政策的调整，说明集体提留的确影响了农民生活，以致社员将集体公积金和公益金提留称为“二公粮”¹⁷，其作用与国家税收相似。如图1所示，在“大跃进”运动时期，农民年度的粮食生产收入如一个带有可移动漏口和木栓的水桶，产量高低决定了木桶最高水位，国家税收、国家统购¹⁸、集体提留、公共食堂是水桶由上至下的四个漏出口，国家和集体通过调节漏口和木栓的位置决定国家征购及集体提留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粮食总产出在漏出国家征购及集体提留之后的余额才是农民名义的口粮消费，公共食堂制度又使得农民口粮消费实际量远低于名义量。换言之，在集权体制下，农民个体的食物获取权排在国家和集体之后，“大跃进”运动中集体高积累挤占农民口粮消费是饥荒的主要原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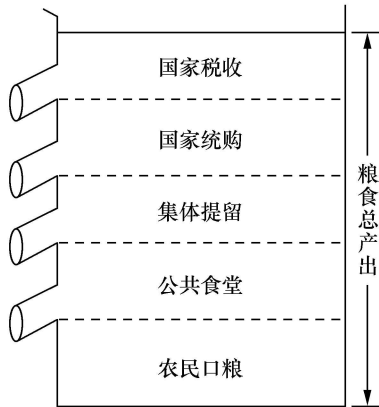


图1 “大跃进”饥荒中农村粮食分配机制

三、实证研究的问题及方向

如上所述，“大跃进”饥荒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由于缺乏完整的数据，确定各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成为大饥荒研究的难点。表3总结了国内外关于“大跃进”饥荒成因的实证研究方法、主要变量及结果。Yang (1996, pp. 59—64) 以1959年各地区党员人口密度作为代理变量，分析政治激进主义对公共食堂参与率及人口死亡率的实际影响。Chang and Wen (1997) 以1959年各地区公共食堂参与率与累积的过度死亡率做相关性分析。Lin and Yang (2000) 用乡村人口比例作为代理变量检验了城市偏向假说。Kung and Lin (2003) 在模型中同时引入地区解放时间、公共食堂参与率、党员人口密

¹⁶ 在1961年6月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第二十五条规定生产大队扣留的公积金控制在大队可分配的总收入的5%以内，公益金扣留比例3%—5%(黄道霞等, 1992, 第634, 643页)。

¹⁷ 新逸(2005, 第54页)。

¹⁸ 国家统购对农民集体而言本是一项收入,但由于统购价格过低,实质上构成了一项净漏出。

度,发现以地区解放时间衡量的高消耗工程对饥荒有显著作用。曹树基(2005)发现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与“大跃进”时期地区死亡率之间负相关。范子英和孟令杰(2006,2007)以经济作物播种面积、人均农地资源禀赋作为代理变量对其缺粮区偏向假说进行实证研究。

表3 中国“大跃进”饥荒成因实证研究概况

作者	假说	关键变量和指标	数据和样本	检验方法	检验结果
Dali Yang, 1996	政治激进主义	地区共产党员人口比 均国民收入 NIPE	25个省 1956年 DPM 和 1957年 NIPE	简单线性回归	DPM与饥荒严重程度成反比,NIPE不显著
Chang and Wen, 1997	公共食堂制度	公共食堂参与率 DHPR	1959年 25个省公共食堂参与率与非正常死亡率	简单线性回归	公共食堂参与率与非正常死亡率显著正相关
Lin and Yang, 2000	城市偏向	以地区农村人口比例衡量城市偏向政策,以两年移动平均人均粮食产量衡量 FAD	28个省级地区 1954—1966年数据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城市偏向政策比 FAD 对饥荒的影响更大
Kung and Lin, 2003	政治激进主义	以地区粮食净征购率、农村人口比例控制城市偏向,以地区党员密度 PMD、公共食堂参与率 MHPR、解放时间 TOL 衡量激进政策执行	21个省级地区 1958—1961年数据	单向固定效应模型	TOL显著影响地区死亡率,PMD、MHPR不显著
曹树基, 2005	历史记忆说	1851—1875年和 1959—1961年分府死亡人口比率	以清代“府”级为分析单位,涉及 18省 248府	简单相关性分析	百年间地区死亡率负相关
范子英和孟令杰,2006	缺粮区分	以地区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比重 IP、人均播种面积 CPP 衡量新缺粮区和传统缺粮区、农业人口比重 UP 衡量城市偏向	28个省级地区 1954—1966年数据	Probit 模型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IP显著降低地区死亡率,未发现 UP对地区死亡率差异有显著影响
范子英和孟令杰,2007	缺粮区分	以县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比重 IP、人均耕地面积 POP、城镇人口比重 UP、粮食征购后人均拥有的粮食数量 CCP	江苏省 55个县 1954—1977年的数据	双向固定效应	IP、POP、CCP对地区死亡率的影响不稳定,UP对地区死亡率显著影响但绝对量较小

注:本表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在现有实证研究中,Kung and Lin (2003)、曹树基(2005)所使用的变量较好地解决了内生性问题。Kung and Lin 的模型以地区解放时间先后排序作为政治激进主义的代理变量,符合计量分析外生性要求。地区解放时间对于大饥荒死亡率而言是外生给定的,但由于后解放的地区南下干部为表示对中央的忠诚而采取更为激进的政策,从而跟政治激进有关。曹树基使用的太平天国时期地区累计死亡率对于“大跃进”饥荒人口死亡而言也是外生给定的,且由于百年前经历过严重灾荒的地区存在“历史记忆”而尽量避免粮食高征购,所以与“大跃进”饥荒人口死亡率负相关。因此,解放时间、地区饥荒史均可以作为广义政治激进主义的工具变量。但这类变量是截面数据,没有反映时序变化的信息。¹⁹

¹⁹ 令人疑惑的是,解放时间作为截面变量在 Kung 和 Lin 的固定效应模型中应该被舍弃掉,但文章报告了该变量的结果。

其他研究所使用的变量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内生性问题。Dali Yang使用的1959年地区党员人口密度与解放时间变量本应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一般来说老解放区党员人口密度较高，但1959年的数据掺杂了太多饥荒的因素。例如，如果农村党员享有食物获取优先权，那么党员密度高的地区死亡率较低。公共食堂参与率、乡村人口比例、经济作物播种面积等变量均可能是政府政策选择的结果：政治越激进的地区，公共食堂参与率越高以显示拥护社会主义道路，城镇人口增加越迅速以加快城市化，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增加越多以支持工业化。

《饥荒》一文分别以灌溉面积比例、集体工业产值和普通中学在校生人数作为集体积累的代理变量，可能存在类似问题；而且前两者也是衡量激进主义和高强度劳动体能消耗的变量（Yang, 2010）。《饥荒》一文的模型中引入了诸多控制变量，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其研究意义有二：第一，文章在数据收集和处理上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推进了一步。例如，我们在衡量FAD因素时考虑了粮食库存及省际调拨的影响，并将粮食计算口径统一为贸易粮；以农村返销粮准确度量了缺粮区偏向因素。第二，集体高积累对饥荒的影响包括生产效应、健康效应和分配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说，《饥荒》一文扩展了Kung and Lin (2003)的研究，突出分析了集体积累的分配效应。如何定量分析这三种效应是研究的难点。Li and Yang (2005)已研究了“大跃进”运动的农业资源转移对生产的影响，如何进一步区分健康效应和分配效应对饥荒的作用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

实证研究的内生性问题还有一个未引起注意的方面，即饥荒因果关系存在联立性。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一系列激进政策对人口死亡的影响，实际上，饥荒反过来对政策调整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人口大规模非正常死亡的事实面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不得不在1961年春开始调整政策：在城市减少城镇人口、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缩短重工业战线，²⁰在农村降低粮食征购、减少集体提留、加强对农业的支援、解散公共食堂、缩小农村经济基本核算单位等。²¹在饥荒后期，一般来说，人口死亡越严重的地区政策调整也越迅速、越彻底，该地区饥荒结束得也越早。²²因此，激进政策与人口死亡互为因果关系，要准确衡量各因素对饥荒的作用必须考虑这种联立性问题，这是未来计量研究的另一方向。

²⁰ 柳随年(1982,第11—12页)。

²¹ 例如，粮食征购率从1959年的39.7%降至1961年的27.4%、1962年的23.8%(农牧渔业部计划司,1983,第342页)，集体提留比例从1959年最高值的17.11%降至1960年的6.2%(刘愿,2010,表1)。1961年3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明确了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1961年6月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明确解散公共食堂。调整后的社队数量增加、规模减少，农村普遍实行了粮食分到户的办法，公共食堂正式解散，见1961年9月6日《毛泽东对〈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的批示〉》。(黄道霞等,1992,第647页)。

²² 饥荒结束的主要原因不在于达尔文效应，而是人口过度死亡后的政策调整。具体见文贯中和刘愿在《再论公共食堂退出权在“大跃进”饥荒中的作用》中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四、跳出具体政策看“大跃进”饥荒 ——饥荒理论的政治权利视角

既然饥荒成因是多方面的,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对“大跃进”饥荒的作用便成为研究的重点。范子英指出了这种综合研究可能存在的问题,认为“简单将这些解释糅合在一起则会更加混淆,以此来判断各解释的重要性则可能是错误的”。考虑到各项激进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一担心不无道理。不过,各项激进政策对饥荒的作用机制是有所差异的,在政治激进主义的大背景下综合考察各项具体政策对饥荒的作用机制及其相对重要性,具有现实可行性和重要意义。尤其是,透过这些激进政策探讨其根源至关重要。根据森(2001,第55页)的定义,饥荒是“食物消费水平的突然大幅度下降”引起的。问题是,为何饥荒受害者的食物消费水平突然大幅度下降了?综合现有的研究,中国“大跃进”饥荒成因是:在粮食减产的背景下(尤其是1959—1961年),国家通过高征购和集体通过高积累减少了农民名义上可支配的粮食,强制性公共食堂制度的一系列恶果又进一步降低了农民实际消费的口粮。

正如两位评论人指出的那样,无论是国家高征购、集体高积累,还是强制性公共食堂制度,从本质上来说都是政治激进主义在不同层面的表现。在集权体制下,普通农民因政治权利缺失,其食物获取权遭受国家、集体和乡村特权阶层的剥夺,导致“大跃进”饥荒的发生。虽然饥荒研究已经发展了丰富的概念框架和完善了有关实证研究,但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中饥荒的理解仍然是相当初步的。²³回顾历史,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饥荒发生频率最高、影响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人口死亡最多。²⁴因此,饥荒在集权体制与分权体制下的发生机制有所区别。

在20世纪初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行性的大辩论中,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型以中央计划机构的偏好取代个人自由选择来解决社会选择问题。²⁵哈耶克敏锐地指出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根本问题,即中央计划机构指导活动必然侵犯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哈耶克认为,在一个计划的制度下,所有经济问题都变成了政治问题,计划经济要求社会成员就各种不同需求的相对重要性达成广泛共识,而计划当局只得通过使用强力和宣传这类手段来促使人们达成这种共识并且强行实施一种共同的价值序列。²⁶新中国在匆匆完

²³ Ravallion(1997);O'Grada(2007)。

²⁴ 在社会主义国家90年的历史中共发生了6次大规模的饥荒,平均每15年就爆发一次饥荒;苏联先后爆发了三次饥荒(1921—1922,1932—1933,1946—1947),中国“大跃进”饥荒先后持续了四年(1958—1961)并肆虐全中国,朝鲜在1995—1997年爆发严重饥荒,十年后又再次面临饥荒的威胁。

²⁵ Oskar Lange(1936,1937)。

²⁶ 哈耶克(1940,第293、297—298页)。

成社会主义经济改造后就迅速建立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赶超和优先发展重工业即成为“大跃进”时期中央计划机构要强行实施的价值序列，人民尤其是农民的吃饭权被强制置于工业化目标之下，其政治权利系统性的缺失最终演化成一场严重灾难。

苏联和朝鲜历史上饥荒发生的根源与“大跃进”饥荒相似。例如，1932—1934年苏联乌克兰大饥荒也是在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农业集体化背景下发生的，国家粮食高征购如“铁扫帚”（iron broom）般过度搜刮了农民的口粮，政府隐瞒甚至否认饥荒的事实并拒绝接受国际机构的粮食援助，最终导致约500万人口死亡。²⁷朝鲜两次饥荒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在朝鲜人民忍饥挨饿之际，朝鲜的军事实力尤其是导弹及核武器技术却突飞猛进，以致Stephan Haggard（2008）在分析朝鲜饥荒时不无讽刺意味的说“让朝鲜人民以‘主体思想’为食吧”。²⁸因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的饥荒发生机制相似，发展一个包括政治权利在内的饥荒理论，是深入理解集权体制下的饥荒现象的钥匙，也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

参 考 文 献

- [1] Almond, D., L. Edlund, H. Li, and J. Zhang, “Long-term Effects of the 1959—1961 Famine: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in Ito, T., and A. Rose (eds.),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the Pacific Rim*, NBER-EASE Volume 19.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 [2] 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
- [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 [4] Chen, Y., and L. Zhou, “The Long-term Health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1959—1961 Famine in China”,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2007, 26 (4), 659—681.
- [5] 范子英,“关于大饥荒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9卷第3期,第1151—1162页。
- [6] Chang, G., and J. Wen, “Communal Dining and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8—1961”,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97, 46(1), 1—34.
- [7] 国家统计局,《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1949—1979)》,1980年。
- [8] 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公安部三局,《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
- [9]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
- [10]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 [11] 胡代光,“四季青蔬菜生产合作社的公共食堂是怎样办起来的”,《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58年第4期,第97—104页。

²⁷ 斯大林将农民抵制交粮的行为视为一场由农民发起反抗苏联统治的战争。但正如Dalrymple(1964, pp. 250—284)所说的那样,特别奇怪的是,在这种战争中农民唯一的武器是消极的对抗。

²⁸ 朝鲜“主体思想”(Juche)最早由金日成于1955年底在反对苏联的去斯大林政策时提出,在20世纪60年代中苏分裂的政治压力下逐渐演化成朝鲜国家意识形态。1965年4月金日成进一步提出“主体思想”的三个原则:政治独立、经济自给、国防自卫。1982年金正日《关于主体思想》一文赋予“主体思想”明确含义并将之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1996年金正日将“军事优先”政策融入“主体思想”中。

- [12] 黄道霞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
- [13] Kung, J., and J. Lin, "The Causes of China's Leap Famine, 1959—1961",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003, 52(1), 51—73.
- [14] 刘愿,“‘大跃进’运动与中国1958—1961年饥荒:集权体制下的国家、集体与农民”,《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9卷第3期,第1119—1142页。
- [15] 龙宇文,“公共食堂积弊千日,解散一时——丰城县小港公社公共食堂追记”,《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88年第4期。
- [16] 罗平汉,《“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 [17] Meng, X., and N. Qian, "The Long Term Consequences of Famine on Survivors: Evidence from a Unique Natural Experiment using China's Great Famine", NBER Working Papers 14917,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09.
- [18] 农牧渔业部计划司,《农业经济资料(1940—1983)》,1983年11月。
- [19] 农业部计划局,《农业经济资料手册》。北京:农业出版社,1959年。
- [20] 四川省农牧厅,《四川省农业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2)》,1983年6月。
- [21] 文贯中、刘愿,“从退堂权的失而复得看‘大跃进’饥荒的成因和教训”,《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9卷第3期,第1083—1118页。
- [22] 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 [23] 薛暮桥,《薛暮桥经济论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 [24]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
- [25] 杨涛,“探讨大饥荒的成因:集权、计划失误与政治行为的影响”,《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9卷第3期,第1143—1150页。
-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

A General Theory on the Causes of China's Great Leap Famine: An Argument on Political Rights

YUAN LIU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Yang and Fan's comments, we re-clarify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Is Sen's famine theory applicable to the famines in planning economy? Did the excessive collective accumulation of people's commune during great leap forward decrease the peasants' food rationing? How to empirically measure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famine's causes? Finally, we suggest that it is the key to develop a famine theory incorporated with political rights to understand the famines in planning economy.

JEL Classification I38, N55, Q18